

对于网络媒体的一些探究

——《应用伦理学》课题研究报告

课题小组成员：唐小立、金超逸、许基坪

2011/12/7

目录

1. 总论.....P. 2
2. 关于网民热情的乍现和消退的调研报告.....P. 3
3. 浅析网络传媒中的伦理问题.....P. 11

总论

在网络热点层出不穷的当下，对于此类事件的关注一向并不缺乏。但另一方面，鲜少有人考虑到在热门过后，这些事件最终的走向又会如何，因此我们小组决定跳出分析事件的局限，考察这一现象本身。并且，通过网络传媒所透露出的道德伦理问题也让我们感到值得需要探究。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们确立了这一主题。但在实际分析过程中，组员们对于某些具体观点进行交流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争论。考虑到争论本身的价值及双方思考的深入程度，我们决定通过论文集的形式，在追求一致的同时保有相互的差异。

关于网民热情的乍现和消退的调研报告

金超逸 11300240035 计科

许基坪 11300240088 计科

目录

一、 网络热点的井喷和消亡

(一) 内容概要

(二) 典型案例

二、 载体——对于网络的分析

(一) 互动性

(二) 海量性

(三) 迅速更迭性

三、 主体——对于网民的分析

(一) 热点产生

(二) 热点消失

四、 对勘国外类似事件——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一) 案例及疑问

(二) 公民社会——力量的匮乏

(三) 道德层面——灵魂的偏倚

五、 总结

一、 网络热点的井喷和消亡

(一) 内容概要

一月份：空巢老人；二月份：微博打拐；三月份：日本地震；四月份：瘦肉精；五月份：私奔；六月份：郭美美、故宫门；七月份：甬温高铁事故、达芬奇家具；八月份：卢俊卿；九月份：美国大使；十月份：小悦悦；十一月份：校车；十二月份：？

以上是网络上的 2011 关键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事件层出不穷、热点屡屡变换，但在短暂的热门过后，真正解决问题的能有几个？在国内，这个问题尤为严峻。许多的热点事件，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关注后，归于沉寂，不了了之，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却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有人说，网络就是一个出气口，人们的不满在这里发泄；发泄完了，也就不再那么愤怒了。诚然，这确实可以让社会不至于过不稳定而濒临崩溃。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真的就没法解决了么？为什么每每重大事故最后都找“临时工”来负责，而那些隐患似乎仍然未能有力化解，让人们放心？为什么那么大的损失，事件仍是一件接一件的发生？难道那些无辜的生命就这样白白送掉了？他们的血能不能不白流？

这些质问不容忽视！

因此，我们将通过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探索可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 典型案例

2009 年 6 月，一篇题为《最年轻市长硕士期间论文涉嫌抄袭》帖子在网上流传。发帖者称，周森锋在清华期间投稿发表的一篇论文，与他人早前所写论文相似度超 50%，怀疑涉嫌抄袭。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号称“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方舟子先生抖出猛料，于 2009 年 6 月 27 日在其新浪博客中贴出一文，名为“‘最年轻市长’周森锋的两篇论文都是抄袭之作¹”。

23 日，有人在网站上发帖，贴出了周森锋有专人在背后撑伞的工作照，惹来网友批评。照片显示，在一处田地里，周森锋背着双手，面对镜头，貌似正在摆 pose，他的背后有一人给他撑着伞。所谓的“高价烟”更将这位当时年仅 29 岁的周市长置于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是，自此事被网络围观之后，周森锋至始至终保持低调和回避。不久，网络关注降温，打开网页，问津者鲜。

但这件事还没有终了。2011 年 4 月，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称，周森锋同志拟

¹ 附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dzdm.html?tj=1

被“交流提拔任职”，这位年轻的周市长再次成为网络围观的对象，而有关他的“论文抄袭门”则又卷土重来。周森锋“论文抄袭门”再次成为网络热点。然而，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回应中对此只字未提；清华大学一直保持沉默，至今仍无调查结论公开；其本人也没有正面回应过此事。此事再次石沉大海。

2011年5月12日，周森锋被任命为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代理林区人民政府区长。

二、 载体——对于网络的分析

要对这一案例进行分析，首当其冲的就是载体的影响。我们知道，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介，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媒介的特点：

（一） 互动性

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传媒更具有互动性。传播不再掌控在某些专业人士手中，任何一个普通民众都有参与其中的能力，这也让他们更有兴趣关注热点事件。当人们看到某条消息时，他们根本不需要、也不会有太多的思考，所要做的只是简单的点点鼠标、随意写两句评论再将其转发出去。这种形式简单的参与却有着难以计量的巨大效果——当一条微博、抑或一篇博文被转发数万次、数十万次时，它将引起整个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网络传媒”其本身。并且这种关注大多是缺乏理智的——轻易煽动的群情激昂，往往意味着一个人在内心道德感的驱使下冲动行事。我们可以看到，方舟子的博文有近十万次的浏览量，倘若不是网民们的“积极投身”，这一篇短短几千字的文章，哪里会如此地引起热议？

（二） 海量性

同时，又由于互联网信息量巨大，全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发稿，使得人们的注意力极易被分散。接受了大量垃圾信息的结果往往是无法辨识其中真正有价值、值得关注的部分，这在一方面也导致了网络关注的降温——当这一事件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时，实在是很难再挖掘出来。

（三） 迅速更迭性

网络热点的迅速交替也使得人们轻易改变关注对象。有这样一句戏言：“因为达芬奇，郭美美只火了两个星期；因为赖昌星，达芬奇只火了一个星期；因为动车，赖昌星只火了半

天……”虽略带调侃，却不无道理。当周森锋事件始终无法得到回应时，新晋的热点事件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当新一轮转发热浪涌起之时，也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无论这一事件曾经获得过多大关注，它也终将销声匿迹，成为过去。

三、 主体——对于网民的分析

另一方面，从网民的角度来看，对于热点事件的关注往往不是出于事件本身的思考，而仅仅是人之本性——好奇心在作祟。

（一） 热点产生

所谓“热点事件”，必定噱头十足、吸引眼球，而其用于吸引眼球的部分就在于猎奇而充满爆点。所以，当人们被一个事件成功地吸引了注意力时，瞬间的道德使命感促使他们狂热地投身其中。并且，由于获取信息与维权的渠道受到阻碍，网民获取真相的欲望受到压抑，网络这个大平台可以提供比传统媒介更丰富的信息，吸引他们参与；同时，他们心中充斥着正义感无处抒发，只能选择在网上发表见解、甚至是“过激言论”，这更加使热点话题升温。周森锋的论文本是人们不知道的东西，经网络爆料为人所知，并且互联网之便捷使找到周森锋论文的“老底儿”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充分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贵为“领导干部”的周森锋，人们没有机会当面诘问他，或是通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要求其给出一个满意的说法，只有网络，在网上可以相对较为自由地发言。热点因而在网上爆炸。

（二） 热点消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事件不可避免地不再新鲜，网民失去了对它的好奇，就会自然而然地摒弃它，投入下一个热点事件。此外，由于网民们大多有自己的工作，通常只能在闲暇之时关注社会热点。

——这样看来，网民热情的迅速消退似乎是不能被指责为“不道德”的：这确实合乎人性，顺天致性；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仍愿意关注社会，这难道不是道德修养的体现吗？

四、对勘国外类似事件——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一）案例及疑问

2011年3月1号中午11点15分，古滕贝格在柏林发表了正式声明，宣布辞去国防部长职务。而他辞职的原因，恰恰就是卷入论文抄袭丑闻！事情开始于大约二月中旬，德国媒体曝光古滕贝格在博士论文中大量引用他人文章，而没有注明出处，存在严重抄袭现象。

这就让我们产生疑问：同是社会热点爆出的“论文门”，缘何在德国让一位国防部长下了台，在中国却不了了之？如果不了了之真的是网络社会热点的必然结果，那又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二）公民社会——力量的匮乏

我们注意到一些细节：德国学术界认为，古滕贝格撰写博士论文的态度说明他是学风不严谨的人，而德国总理对他的支持，会损害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学术严谨的形象。对古滕贝格的批评浪潮愈演愈烈。2月底，超过2万名学者向默克尔递交了一份集体签名信，抗议默克尔袒护古滕贝格。这成了压垮古滕贝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次事件中，德国学术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持续施压，使得古滕贝格尽管公开认错、道歉，博士学位也被拜罗伊特大学收回，仍不得不作出辞职的决定。

这不禁让人想到“公民社会”的概念。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又称市民社会)，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公民社会里的公民拥有公民意识，“在一定的公共领域内集体行动，表达他们的兴趣、情感和观点，交换信息，追求共同目标，向国家提出要求，并让国家官员负起责任²”。公民社会涵盖了了大量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这些组织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政府组织(NGO)，这些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监督并限制权力的行使”，“创造了独立于政党之外的若干渠道来进行利益的表达、集中和代表”³。在古滕贝格“论文门”事件中，德国学术界的组织团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持续施压使得有关方面不得不做出实质性的回应。这就是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力量。

而反观国内，不得不承认公民社会的发展还相对不成熟。有这么一个说法：“纳粹要杀

²拉里·戴蒙德《市民社会与民主化》(Larry Diamond,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7—240.)

³ 同上。

犹太人，我们不管，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要杀穆斯林，我们不管，因为我们不是穆斯林；要杀天主教徒，我们不管，因为我们不是天主教徒；最后，纳粹要杀我们了，我们发现，没有人可以为我们说话了。”公民意识，其实也是一种保护他人权利、维护社会公平的意识，因为公民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兴亡有自己的责任。而国内的民众，上网关注社会热点，似乎很多并非出于这种公民意识，而是出于猎奇、从众，或是满足发泄欲望的心理。很多人表达关注，表达不满，却并没有真正去参与解决的勇气和决心。因此，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进 NGO 的发展。NGO 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在于，它可以将分散的民众的力量会聚起来，形成足以与损害大众权益力量抗衡的合力。在网络热点由于其特性逐渐降温以后，成熟的公民社会中会有相应的 NGO 来接手这个事件，并持续关注、施压，直到有关方面给出合理的答复。NGO 的缺乏，使国内民众缺乏伸张人性中正义一面的渠道，只能有事不关己的围观和无可奈何的放弃，或是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三）道德层面——灵魂的偏倚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网民对于热点事件的关注除了极少数的真正思考外，大多不外乎两种态度：围观，或者走极端。

从“围观”来看，他们并不真正关注这些发人深省、拷问内心的话题——他们不过是凑个热闹而已，用“道德”的大旗掩盖自己空虚的内心。事情的发展在他们眼中俨然成了一场闹剧，一场只需点点鼠标就能轻易推动的简单闹剧，并且更可悲的是，往往曲未终，人已散——这也就是为什么网络热情会消退得那么迅速而丝毫不带留恋。而另一方面，围观更是源于从众的心理：“既然大家都关注这件事，我当然不甘人后！”从众意味着盲目、随意、不需要思考——尤其当我们看到成千上万条千篇一律的回复时，这种不假思索的跟从显得更加可笑。也许这些人当中的一大部分从头至尾都不知道这个社会热点究竟是什么，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关注”这一事件，这也能够解释他们为何乐此不疲：一知半解就能出口成章，又能不费吹灰之力为自己博得个“有道德感”的高帽子，何乐而不为？至于社会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后续的发展如何，与我何干？就算事件不了了之，也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奇热点，至于别的，谁在乎呢？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在网上形成了“刷屏”的态势，谣言满天飞，一条接一条地转发。很多人只是跟着转发，却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其真实性。像一个有关方面处理车厢时疑似有人掉落的图片，很多网民纷纷怒斥当局处理之野蛮。但后来清晰度更高的图片显示，那不是一个人。其实，网络提供大量的信息，

如果我们力求真相，结合各方信息，加以理性的甄别、判断，是可以更接近真相的。非常遗憾的是，很多网民只是停留在了“表现得很正义”上，对真相的追求并不像嘴上说得那么真切。随大流，似乎大家都这么说，不跟着一起就是“不道德”，殊不知这种不加理性判断的盲从才是不道德的行为。或许批评的对象确实值得批评，但批评还是要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缘于这种态度，对问题的解决就会“后劲不足”，所以有关方面只要像周森锋一样拖一拖，危机也就过去了，以前怎么着还怎么着。

再说到“走极端”。普遍的观念比较赞同“走极端”，认为这是一个人具有社会使命感、富有正义感的体现，愤青般的语言恰恰表现了其道德的高尚——敢于指摘社会的问题。然而我们知道，道德追求的是一种德性，即通过适当的方式追求善、追求真。这种激进的方式难道能被称为“适当”吗？不。事实上，这些人需要的只是一种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快感，用看似道德的行为掩饰不道德的目的。他们对于社会的怒斥，实则是将所有的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谴责他人的不作为、抑或是社会品德的普遍堕落；然而对于他们自身，却从来没有想过一丝半点的行动。就像对方舟子，很多网民批评他抓住李开复不放，为什么不多打一些大贪官。可是，他们自己却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行动。他们对方舟子求全责备，实际上就是推卸责任，把所有的事儿推到方舟子身上，方舟子做了“学术打假”工作他们却指责他做得不够好，他们自己无所作为却心安理得。此外，真正的道德必须是在充满理性的情况下主动地做出选择、完善世界，而这种破口大骂显然是丧失了理性的——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理智，因为他们对这件事本身毫不关心，不过是寻到了一个发泄口罢了。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可能长久地关注某一事件、直到其得到满意的解决？不要说“长久的”关注，也许等他们关掉网页，就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了！这种通过某一事件瞬间激发的“道德感”并非真正的“道德感”——真正具有道德的行为应该是出于内心对于社会的关照、理性对待其中的问题，提出合理的建议并为之不断努力、取得成效，这是一个持续而长期的过程。君不见，网上的“斗士”，表达极端的观点，并把不和他一样走极端的人统统斥为“不道德”，排斥异己，很有道德优越感的样子。一言以蔽之，这种看似忧国忧民、极具道德情操的大肆批判，本质上是一种“伪道德”。

五、 总结

这是一种整体的“不道德”，并不是靠一两个人道德的提升就能解决的。或许会有一两

个清官，或许会有几个人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但社会整体的麻木和势弱，让这力量显得那么微薄，如杯水车薪。根据上面的分析，唯有公民意识的提高、公民社会的积淀和培养，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如果社会中相当的一部分能够对社会有更强的责任感，如果公民意识真的深入人心，那么团体的力量是巨大的，相应的非政府组织会在这力量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去消化网络热点，人们维护权利、追求公平与正义将有一个有效的途径，而不再显得那么势单力孤。这样，网络热点才不会像天边的流星，闪亮刺眼地出现却转瞬即逝，空留下依旧悬而未决的问题。

浅析网络传媒中的伦理问题

唐小立 07300160033

互联网作为人类 20 世纪最伟大的基础性科技发明之一，如今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由于在时间场所限制、内容时效性、信息筛选自由度等诸多方面的条件都优于传统传媒，网络传媒已经成为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甚至于网民这一群体也成为了重要的舆论主体，在诸多的热点事件中发挥着作用，很多传统传媒亦纷纷将目光转向网络平台，藉由网络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然而，在中国互联网传媒一片繁荣的表象之下，其内在却并不如表面那样光鲜动人。剥去其光鲜的外衣，我们应当看到，如今的网络传媒之中潜伏着深刻的伦理问题。然而，要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就要首先了解网络传媒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质。

近几年，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网络传媒方式的井喷式发展，使得中国网络传媒与传统传媒的差别日益增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参与资格放宽。民众不再只是情报的接受者，也是发布者和传播者；不再只是新闻的旁观者，也是新闻的当事人。民众参与一个热点新闻、发布评论、传播观点变得更加容易。
- 二、传播方式交互化、立体化。信息的传播更富时效性、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刺激接受者的感官，更能提高接受者的关注度；同时，先进的搜索机能使得接受者对情报的选择性更加自主和自由。
- 三、传播内容的碎片化、去中心化。这一点尤其在微博这一平台上最为体现。发布字数的限制、信息更新的快速、信息总量的愈发庞大，都在客观上要求了传播内容的简单化、碎片化，限制了某些复杂而有深度的内容的传播，从而使得网络传媒日渐体现出大众文化的特征，同时，也给予了主流之外的观点和言论的容身之地，使“沉默的大多数有了更多的发声机会”。

然而，正是这些特质，结合互联网自身的固有特质，给网络传媒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根据个人的观察和总结，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新闻传播主体的扩大与道德责任的弱化
- 传媒的社会责任是新闻伦理研究的固有问题之一。对传媒自由的界定、对新闻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之间平衡的把握历来是这一领域争论的焦点。但当网民这一庞大

的主体参与到新闻传播的活动中、成为传媒的主体时，问题开始向着奇妙的方向发酵了。

网络主体道德责任的弱化本身就是互联网环境中的固有问题。由于互联网这一环境的特殊性，导致了网络主体的主观价值标准模糊化和自主意识降低，自律道德弱化，并因此而造成网络道德失范。由于互联网缺少规范和监督，所以网络中的个体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再加上网民在现实中的自主道德意识存在问题，网络环境再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主体不负责任的言论，可能直接导致众多跟从者的不负责任，最终将导致整个网络社会责任意识的淡漠。

而作为传媒主体的网民，却同时继承了这样的无责任性特质，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主观上对“法不责众”的投机心理等，使得网络成为了偏激言论、谣言滋生的温床。以微博平台为例，每天谣言的产生数目及其转发量都十分惊人，而由于造谣与辟谣的成本的巨大差距，包括微博辟谣的官方帐号以及志愿协助的私人帐号在内的辟谣消息的发布和转发量则相反地非常少。而大多数参与传播谣言的网民则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作为接受者、被欺骗者，并没有承担责任的必要，亦即参与谣言的发布与传播的网民们尚且未意识到自己作为新闻主体的一种地位——或者可以这样推测，在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中，网民尽管参与了实质性的传播过程，但为了避免责任，而将传播主体的这一身份进行了有意识的忽略，成为了无责任的传媒主体。这使得新闻伦理中探讨的传媒主体的责任在论述网络传媒主体时显得十分无力。

二、 去中心化的传播内容与强势意见的形成

新浪微博以其去中心化、碎片化的传播方式而闻名，并以百家争鸣式的开放平台而得到了网民的青睐，但诸多微博热点事件证明，这种百家争鸣的多元化只是一种幻象。新浪微博官方亦表示，事实上微博这一平台更容易形成强势意见，并且在这一环境中，对偏离性的弱势意见的容忍远远低于现实世界。看似一个多元化的平台最终导向的舆论却是由强势意见统治的。而在这样强势意见的生成中，论理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甚至在大多数案例中并非一个主要因素，而情绪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乡土情绪、民族情绪、阶层差异、被害妄想、仇富心理等诸多情感、心理的因素成为决定强势意见形成的关键，也促成出如“是中国人就转发”、“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上海人”等一系列微博关键词。诸多的热点事件，如药家鑫案、郭美美案、孔庆东案等，整个网民群体在论及这些事件时处于一种近似于狂欢一般的状

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形成的舆论，很难想象被叫做“理性”的东西仍然留存其中。同时，碎片化的传播与如今快餐化的生活节奏相互作用，使得民众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愈发趋于一知半解、浅尝辄止，不去对事件各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反省和批判，并在这种浅薄的状态下又同时充当了信息的发布者，对这一现象进行推波助澜。

三、信息选择的自由与大众新闻嗜好

网络的出现使得我们能够获取的信息总量呈爆炸性增长，一些主流媒体很难看到的碎片新闻、冷门信息、个人情报、小道消息都能通过网络平等地展示出来。而信息总量的增大与个人索取的限度的矛盾导致了如今的时代大众与新闻呈现了“僧少粥太多”的局面，客观上要求大众对新闻进行选择性地接受。实际上在较为宽松自由的传播环境中，普通人可能更易于接受轻松的内容。信息选择的自由，有时候意味着舒服、娱乐、满足各种好奇刺激等。这对新闻传播的主体而言，想要吸引大众的眼球，一是加强新闻的修辞性，二是新闻题材本身的刺激性。但无论哪种方法，在新闻数量增多的同时，大众对新闻的麻木度也会增加，而新闻的煽动性和刺激性只能进一步升级，导致出现了“人咬狗”类的新闻素材、“阴谋论”一类的负面报道的愈发泛滥。以奥地利禁室乱伦案为例，在百度搜索“奥地利 乱伦”可找到约381,000条结果，谷歌中搜索“奥地利 兽父”（谷歌中文屏蔽了乱伦）可找到约595,000条结果。且不论负面报道本身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单就民众兴趣的转移来看，这样的选择性对社会的安定也是有危害的。长期接触这样的负面报道可能会对接受者产生一种“现实即是如此”的幻影，使得其对社会的态度发生转变，而导致这一后果的恰恰又是他自身的选择，可以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四、话语权的下移与对精英阶层的叛逆

大众参与新闻传播的一大结果便是使得话语权不再为精英阶层所把持，而是为大众所利用。孔庆东骂记者案中，一方面是当事双方利用舆论造势，而另一方面，则是网民利用此事件来表达对一直攫取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媒体的不满。而将精英阶层从神坛拉入泥潭这一行为，则成为网民发泄不满的一种手段。这种不满一方面是由于此前精英阶层对民意的忽视和恣意捏造，所谓“将民众当成傻瓜看”，而另一方面，这样仇视精英阶层的心理的发酵却会殃及其他的领域。诚然，一些所谓的“御用文人”、“砖家叫兽”、“炫富者”着实可恨，但盲目地对精英阶层的所有人都扣上这样的帽子一棍子打死，就显得有点过分。

五、舆论关怀中的道德幻象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民众的意愿并不经过新闻工作者的采集、筛选、整理、加工后发布，而是更为直观地通过发言、评论、转发而表现出来。尽管这一表现方式更加直接，但却更能看出如今民众的舆论关怀中存在的必须击破的道德幻象。我们必须注意到民众对热点事件的关怀往往并非出于道德上的同情，而是出于对话题性事件的猎奇心理、或利用事件达成自身目的的投机心理等等。民众抨击特权行为，往往并非出自对社会公正的追求，而仅仅因为自己并非因此获利的一方，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纵向（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诸多横向领域中，如上海人的“排外”主义，每隔一段时间，这一话题就会被拿出来议论。这一话题的根本矛盾，是外地人和上海人在上海获得利益和福利的差别；与此同时，部分参与者则是通过贬低某一部分人（上海人或外地人）来显示自身的优越性，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至于其他借此煽动地域仇视等的投机行为，在此不多作赘述。关于地域差异的热点话题经常在微博上出现，包括饮食、气候在内的各种话题都会成为地域间争论的导火索，也往往会演变成激烈的骂战。在一些恶性事件中，民众棒打落水狗的行为本身却是充满了谣言与偏见，与被打之“狗”一般无二，却由于占据的道德制高点而并不感到愧疚。扩展到众多为了“社会正义”而进行的人肉搜索、情报挖掘等，尽管打出的旗号冠冕堂皇，但所作所为却是对社会制度的践踏和破坏。民众一方面呼唤正义，而另一方面却期待通过制度之外的、破坏制度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丝毫不为此感到欠妥，一方面体现了制度不完善、政府公信力下降的现状，但另一方面民众的这种心理、这种道德观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

诚然本文只是将笔者所观察到的一些问题罗列出来，并不一定代表如今互联网的主流如此，但这些问题如果不正视、不重视、不去思考有效的规范监督机制而任其滋生发展的话，对社会的潜在危害是巨大的。而作为民众的一员、尤其是网民的一员，在参与新闻传播时，也应时时刻刻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才能保证网络环境的有序、稳定、健康、繁荣。